

實幹換信任 創新贏競爭

□顧敏康



議論風生

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第四屆新政府就職典禮上，梁振英先生正式以香港特首的身份發表演講，重審了其施政理念，包括「以施政成效答謝中央和香港市民信任」、「帶領團隊走進民衆和拉近距離」、「切實回應市民所想所需」、「規範長遠人口政策」、「提升香港競爭力」、「以身作則和廉潔自持」、「加強與立法會合作」、「加強團結和凝聚民心」等。應該說，他的演講雖然簡明扼要，卻能夠引發足夠的共鳴。毫無疑問，梁特首要想在五年時間內真正實現這些許諾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進一步說，上面所提及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容易做的。例如，梁特首在許諾「帶領團隊走進民衆和拉近距離」後，立即落區走訪市民，聽取民衆意見。但是，梁特首這個良好願望，卻因為反對派的阻擾而無法順利實現。日前，梁特首出席論壇的時候，又發生了衝擊會場的事件。面對這種事情的發

生，政府顯然採取的是守勢，更沒有發表什麼譴責衝擊的聲明。倒是有好心人爲梁特首抱不平，指出有關衝擊行爲「踐踏了香港的民主、踐踏了其他不同意見的人向政府表達訴求的自由。」既然落區是好事，就應該理直氣壯地堅持下去。

實幹方能做出成績

如果說落區聽民意選屬於比較容易做到的，那麼，要想「以施政成效答謝中央政府和香港市民信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比取得中央的信任，梁特首要取得市民的信任難度似乎大些。這裡不僅要取決於梁特首「切實回應市民所想所需」，而且要真正做到「以身作則和廉潔自持」和「加強團結和凝聚民心」。看來，梁特首任務艱巨和任重道遠。尤其是當將近十萬市民冒著酷熱上街遊行示威，提出各種訴求時，更加說明了梁特首要實現這些許諾的巨大壓力。本人衷心希望梁先生如選舉特首時那樣，發揚越戰越勇的精神，在五年中初步實現其各項施政理念，則信任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當然，如果事情真的就這麼容易，則寫這篇文章也就失去了意義。香港要想保持其競爭力，必然

要在創新精神上下狠工夫。國家主席胡錦濤日前訪港時發表重要講話，他希望香港同胞進一步弘揚「三種精神」，即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和靈活應變的創新精神。本人認爲，雖然這三種精神缺一不可，但本文關注的重點是其中的「創新精神」。因爲只有不斷創新和開拓，香港才能保持其競爭力；香港也不能一味躺在中央頻頻送來的「大禮」上，反而漸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香港政府有比較寬裕的儲備，完全應該投入必要的資源去培育和推動創新工作。

創新提升本土優勢

創新的目的是爲了提高競爭力，繁榮香港的經濟，讓市民真正受益。當然，對創新應該有特殊的界定。創新不應該是「人有我有」，也不應該是簡單的「人無我有」，而是應該根據香港本地的特殊情況、利用本地的優勢，在本身固有產業的基礎上加入新的元素，力求推陳出新和再創輝煌。其實，香港也有不少令人刮目相看的優勢產業，應當將重點放在這些產業的創新上面。下面從幾個側面提出本人的一些建議，希望引起進一步討論。

有人指出，香港的真正優勢是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香港政府完全可以通過發展教育、醫療等其他第三產業，令香港經濟更多元化，爲各行各業創造發展和盈利機會。如果這是一種創新渠道的話，那麼，香港也完全可以憑藉自己的法治環境和專業隊伍，力爭將香港打造成爲兩岸四地投資貿易爭端解決的中心（關於這個話題，見本人2月3日發表於《大公報》的「港應發展『大中華圈』仲裁」一文）。香港去年外來直接投資增加17%，達830億美元，是全球吸引最多直接外來投資的第四大市場。香港完全有能力憑藉自己的軟實力，爭取吸引外資來港建立亞洲總部，從而使香港成爲專家所建議的外企亞洲決策中心。

香港也是國際旅遊城市之一，如何根據本地情況創新本地的旅遊業，一直也是香港的一個重要話題。香港目前的旅遊產品主要集中在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淺水灣、太平山頂、星光大道以及市區購物和美食。如何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創新是必要的。在這方面，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參考。當年，新加坡政府提出「休閒旅遊業」的理念，不僅要吸引遊客，要留住旅客，而且要讓他們回頭再來。有人曾經撰文高度評價：「旅遊業產品的創新，富有震撼力，投入大，具有高品位。」香港居住空間有限，但爆冷成爲2012年「全球最宜居城市」。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評審機構認爲香港的「郊野公園近在咫尺」，綠色空間很好。既然外國人如此看重郊野公園，那麼，在現有的旅遊項目上將郊野公園納入綠色旅遊的主打產品，不失爲一大創新良策。

作者爲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院長



問責 保龍

麥齊光辭職體現問責精神

□南禮

麥齊光涉「互租物業」事件辭去現職，這是新政府上任後，首位提出辭職的「閣員」，體現的正是本屆政府的「問責精神」。從這個意義而言，梁振英所領導的現屆政府直面問題，勇於承擔，市民應給予肯定。麥齊光承擔了責任，新班子要向前看，香港市民更要向前看。

指點香江

發展局局長麥齊光因涉及「互租物業」事件，昨午提出辭去現職。這是新政府上任後，首位提出辭職的「閣員」。對於許多市民而言，麥齊光在就職短短十二天即「下台」，無不感到詫異。但在問責制度下，一名政府官員必須爲自己行爲負責，辭去局長一職，體現的正是本屆政府的「問責精神」。從這個意義而言，梁振英所領導的現屆政府，直面問題，勇於承擔，市民應給予肯定。

香港特區政府昨午宣布麥齊光提辭的同時，廉政公署當日證實，拘捕了一名特區政府決策局局長、一名政府部門助理署長及另外兩名人士，懷疑他們在申領政府房屋津貼時涉嫌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發言人說，廉署較早時接獲貪污投訴，遂展開調查。

1976年加入政府的麥齊光，做了整整三十五年公務員。在其任內，先後擔任過工程師、路政署署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兩年后退休後，獲聘爲「支援四川重建領導小組」組長。多年的公務員生涯，以及出色的政績，爲他贏得了同僚的讚譽與市民的高度認可。2010年更獲頒金紫荊星章。

「互租」事件影響管治威信

一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早前所說，她對麥齊光有「百分百信心」。這種基於數十年同事所產生的信任感，有理由讓人相信麥齊光的個人誠信。但現實往往過於殘酷，一位如此熱心服務市民、數十年勤勤懇懇的公僕，最終竟會倒在二十多年前的一樁「互租物業」事件上。

麥齊光被某份平面媒體指，1986年至1988年間，他與路政署助理署長曾景文互相租住對

方擁有的名下單位，藉以申請領取政府的房屋津貼。兩年時間裡，總共涉及的款項約二十八萬。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認爲，在八十年代與公務員互租對方單位申領租金津貼的做法，從表面看，如沒有涉及虛報，是真正租住對方物業，並無違反公務員條例。他認爲，當年的租金津貼計劃政策有不足，因此其後推出了自置居所的房津計劃。

無論麥齊光做法是否合法，但有一點無法否認，由於他早年的「互租」行爲，破壞了公衆對他個人誠信的看法，更由此影響到新政府的管治團隊。換言之，他即使是無心之失，卻「中伏」於某些反對派傳媒，更令廉署因此介入。從問責制度角度，他需要爲此採取負責任的態度。事實上他辭去現職，即是這種問責精神的體現。

果斷提辭體現問責精神

問責制和權力密不可分，它的邏輯基礎是有權力就必然要負責任，只要在權力範圍內出現某種事故，必須有人爲此承擔責任。應當肯定的是，麥齊光以高度負責的態度，承擔應有的政治道義。以自己的去職，消除公衆對現有管治班子的疑慮。在新班子上任還未「滿月」之際，他以果斷的決定，爲同儕免去質疑。

對麥齊光辭職，新班子中的行會成員羅范椒芬表示遺憾，並認爲他選擇離開，是明智之舉，這是涉及官員以往的行爲及操守問題，與政府施政無直接關係。對於新班子上任十二日，便有官員辭職，會否影響行政長官梁振英的管治威信，羅范椒芬則認爲，現時是暑假，相信對新政府的工作進度影響不大，但政府需要找人填補空缺。而立法會議員陳茂波則說，願意在這個時間加入政府的人都是有心人。雖然新政府開局困難，希望新班子內每一個人都不要氣餒。

但平時不斷指責「問責制」的反對派，昨日的反應無法不令人感到憤怒。諸如公民黨之流，在廉政公署正在調查事件，尚未作出定案之時，無限上綱上線，將麥齊光個人的事件，說成是整個管治團隊的問題。更無視麥齊光問責辭職的勇於承擔做法，反而指責梁振英沒有做好問責才導致問題出現。至於工黨、民主黨等反對派，亦有類似的指責言論。

理性態度去看事件

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間，尤其是九月立法會選舉期間，麥齊光事件必然會成爲反對派的「談資」，甚至成爲選舉「消耗品」。屆時麥齊光是否有問題已經不重要，在反對派口中，必然是新班子問題，而特首梁振英更是「罪魁禍首」。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問責行爲在西方是再普通不過的事。無論是英法還是澳紐，無論是日韓還是美加，因個人問題閃電辭職的「閣員」比比皆是，公衆並不會由此將所有「閣員」劃作等號。民主社會最珍視的除了自由，還應該要有理性。以理性態度去看事件，社會才能有進步，才不致流入極端對抗。

事實上，一手創立香港問責制的全國政協副主席兼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昨日表示，行政長官梁振英由競選過程至新政府組班中遇到的困難，是民主漸進的一個過程，亦是香港民主政治發展必需經受的洗禮，認爲不應圍繞某些個人問題「搞來搞去」。而他對梁振英有相當了解，認爲對方的優點是有理念、講原則和有愛心。他並說，香港有些人喜歡爭爭吵吵，但香港當下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機遇，希望港人能夠團結在梁振英的領導下，好好把握發展機會。

麥齊光承擔了責任，新班子要向前看，香港市民更要向前看。

暴力政治 不容妥協

□孟東

有話要說

回歸十五年來，在「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香港《基本法》的護航下，香港的民主、自由和法制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伴隨着政治體制民主化所出現的暴力政治也日益凸顯，主要表現爲立法會內的議會暴力和立法會外的暴民政治，這種現象大大毒害了香港的政治空氣。

在立法會內，自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激進勢力通過選舉進入議事堂後，便徹底改變了議事文化，原本和諧安定的議事堂，如今被動粗、髒話、肢體暴力所取代，使議員形象受損。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激進議員雖以人民代表自居，但一味在立法會內搞暴力政治，反而不去代表選民提出訴求與政府溝通協商，根本就不能履行議員應盡的職責。9月份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像這種只講暴力不講合作、有破壞無建設的議員，怎能再獲選民那珍貴的一票。

暴力行爲應受處罰

立法會是一個議政的場地，它有自己的議事規則和對議員行爲規範的特殊要求。作爲民意的代表，議員的言論和表決意向雖不受法律追究，但其行爲需受立法會基本規則的約束。審視全球民主國家或地區之議會，都有着文明的議會文化，議員都需理性地把握自己的議員身份，爲民請命。在民主文化健全的地方，對於議員的暴力行爲都會受到議會相應規則的處罰。

在立法會外，新特首梁振英親自率領問責團隊多次落訪社區，是爲傾聽社會基層底層市民的諸種訴求，深入了解社會問題的關鍵所在，爲日後的正確施政和有效施政做準備。而反對派卻刻意阻撓政府傾聽民聲，社民連和「人民力量」成員多次在會場外叫囂搗亂，污言穢語製造噪音，暴力衝撞前線執法人員，嚴重損害香港講究法治和自由的核心價值。過往，激進反對派曾多次組織遊行示威，但遊行中都伴有暴力衝擊行爲，如多次組織激進勢力圍攻立法會，衝擊中聯辦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更有激進人士在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之際，趁胡主席參觀德輔道碼頭和出席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的機會，在會場叫囂搗亂，破壞會場秩序。

香港基本法第27條雖然授予港人以言論、新聞、出版以及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但這種自由都不是絕對化的自由，不是以犧牲他人的利益爲代價。法定自由必須是在法律允許條件下的自由，不能以損害他人的利益爲代價，否則應受到法律的制裁。雖然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各界別、各團體、各階層的利益訴求有所相同，但基本法已爲利益訴求提供了制度化渠道和方式。在目前的憲制制度下，港人可以通過立法會和區議會兩種民意代議制度向特區政府表達訴求，也可以通過港區人大代表制度和政協制度向中央政府反映訴求，況且，特區政府還通過多個諮詢委員會諮詢民意，新特首上任後還親自落區傾聽訴求。既然訴求表達已有了制度化渠道，就應當通過體制渠道進行理性和平的表達。一直以來，港人都是以遵紀守法著稱，如今在公共場合公然藐視法紀，是對港人自由法治的玷污。

蔓延趨勢必須阻止

由上可見，議事堂內外到處都充斥暴力政治，並且這種現象在香港已存在多年。在批評這種暴力行爲的同時，也應該洞察其存在的原因：一是外部勢力干預，根據之前維基解密披露的信息，外國勢力與香港反對派一直保持着某種聯繫，暴力政治的背後其實隱藏着外國因素的干擾。二是暴力衝擊行爲多是激進反對派有預謀的策劃行爲，旨在通過製造負面新聞增加影響力，吸引社會更多的關注，爲日後選舉贏取選票。三是長期存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至今尚未得到解決，諸如貧富差距、住房問題、年輕人就業及社會流動等等。四是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背景之下，民粹主義氾濫，世界政治開始向左轉，在港激進勢力開始效仿其他國家的暴力衝擊行爲。

暴力政治文化在港不斷蔓延，以非理性的暴力行爲表達訴求，危害巨大。但香港主流社會仍還是理性和平的表達訴求，由民主仍然在法制的軌道內運行，激進勢力妄想依靠暴力增加亮點的「政治騷」只會引致社會的反感，須去力，對暴力政治絕不可包容。

野田搶島修憲暴露野心

□秦陞祺

釣島風波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但日本政府的連串舉動，讓人有歷史倒退到四十年前的感覺。從去年八月當選首相以來，野田佳彥推出連串極右化外交舉措，從推動釣魚島「國有化」、美日沖繩軍演、議員登釣島插旗，本周四再推出允許民衆赴釣島拜祭的所謂建議，其「奪島」目的已是昭然若揭。聯繫到日本國內現狀，野田「黷武」做法仍有轉移視線、牽制反對派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野田在釣島上的舉措，似乎還有更深的意圖，即以釣島爭端作爲武器，借機通過日本憲法第九條修訂，解除自衛隊的「集體自衛權」限制；並以此爲契機，強化日本在區域的政治軍事影響力。

情況其實遠比一些外交評論家所描述的嚴重得多。從今年三月，也即中國與菲律賓、越南就南海主權產生嚴重摩擦之際，日本便抓緊機會，接連出招。在接下去的三月中，推出「全方位」措施，從外交到軍事，由官方到民間，一浪接一浪令人目不暇給。

全方位搶島 圖「強化日本」

例如，今年3月2日，野田政府正式對釣魚列島重新命名；3月23日將「北小島」登記爲「日本國有財產」；4月17日，石原宣布東京政府決定從私人手中「購買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6月10日，六名日本國會議員和右翼團體等共一百二十多人，到釣魚島邊緣海域進行所謂的「釣魚大會

」；6月26日，東京都議會八名議員和兩個「購島」人員，前往釣魚島進行所謂「漁業調查和島嶼狀況考察」、登島插旗。6月2日推進美日韓聯合軍演；7月2日，日菲簽署了「防衛合作備忘錄」，積極介入南海爭端。6月23日，野田主動提出要求視察沖繩（琉球群島），聲稱要「保衛」釣魚島。6月25日，新任日防相森本敏表示，考慮在釣魚島附近駐軍，「堅決捍衛」釣魚島……

短短三個月內，日本政府圍繞釣島而推行的手段，較之過去四十年推出的總數還多，有理由相信如此頻密外交軍事攻擊，日本當局已大幅改變了所謂的「釣島戰略」。這不僅僅是野田政府要轉移國內注意力，牽制反對派，而有着更深的「強化日本」戰略意圖。

本周一，野田政府發言人、官房長官藤村修本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正考慮向國會提交PKO合作法修訂案，修改有關武力使用的規定。」這意味着，日本政府決定修改相關法律，使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的自衛隊在基地外國際機構人員等受到攻擊時，可以予以還擊。

根據宣布放棄交戰權的日本憲法第九條，日本政府禁止海外自衛隊在沒有受到直接攻擊的情況下使用武力。所謂的集體自衛權，是指當日本的同盟國受到第三國攻擊時，可將其視爲對日本的攻擊並對該國發動反擊的權利。過去六十年來，日本政界一直視此爲「國恥」，認爲是日本被貶爲「政治侏儒」的關鍵，極欲除之而後快。修憲努力過去從未停止，但由於時機問題，以及缺乏美國的關鍵支持，一直未能突破。

1992年日本在衆參兩院強行通過了《聯合國

維持和平活動合作法案》（PKO法案）。根據該法案，日本自衛隊可以自衛隊員的身份，攜帶武器裝備，以部隊的形式參加聯合國維持和平活動，且在人身生命受到威脅時可以用武器進行自衛。這被視爲日本修憲的前奏。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在《日本的綜合戰略大綱》中說出一句極具代表性的話，他認爲憲法第九條「缺少有關聯合國安全性的規定和同盟方面義務的規定。」這被認爲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實踐指導」。可以想見，對於日本而言，修改憲法第九條不僅關乎日本的軍事作用，更關乎日本能否重新站立成爲政治軍事巨人，作用至關重要，也被視爲有關關鍵中的關鍵。

復活「自衛權」 當軍事巨人

事實上早在今年四月，這種進一步修憲的建議已經見諸日本媒體。到了本月六日，直屬於日本首相的「國家戰略會議」邊境小組委員會正式提出的引入集體自衛權的建議，野田在國會答辯中聲稱，政府將正式討論是否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

而野田之所以擁有落實修憲的「信心」，正在於他所相信的恰當時機及其正在推行的「釣島戰略」。若中國政府軟弱，則釣島將成爲日本事實上的領土，若中國政府激進，則美日安保更可獲進一步強化。無論如何，釣島始終在日本手中，而日本欲藉此突破「集體自衛權」的限制，一旦限制獲解除，則日本「如虎添翼」矣。

野田盤算不可謂不精心，但他忽視了日本政治的實力弱點，以及中國對收回釣魚島的決心和智慧。野田更應該擔心的是，能否熬過今年任期。